

新传媒

NEWMEDIA

2014.1

主 办 中国传媒大学
媒体创意研究中心

协 办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主 编 宫 承 波



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弘扬
解读当前微电影发展的失范与规制
浅析新闻客户端“手机人民网”的现状和前景
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研究综述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学界立场 | 业界眼光 | 创新传媒 | 生态传播

新传媒 2014.1

NEWMEDIA

主办 中国传媒大学
协办 媒体创意研究中心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官承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传媒. 2014 年第 1 期/宫承波主编.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043-7187-4

I. ①新… II. ①宫… III. ①传播媒介—文集 IV. ①G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4884 号

新传媒 2014.1

宫承波 主编

责任编辑 王 佳

封面设计 亚里斯

责任校对 张 哲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p.com.cn

电子信箱 cr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187-4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新传媒 2014.1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创意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协办

主 编 宫承波

编 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崔蕴芳	成文胜	方毅华	贺 明	黄昕恺	金梦玉
蒋海升	李飞雪	李晓霖	刘年辉	刘 萍	凌昊莹
罗 琳	倪 桓	宋培义	沈楚瑾	唐远清	涂晓华
王 佳	王建华	王 军	王锡苓	闫玉刚	杨 凡
赵光怀	赵云泽	詹 骞	詹新惠	张 丽	张晓红
张晓辉	庄 捷				

本期执行主编

成文胜 吴 迪

本期特约编辑

田 园 王维砚 刘辛未 王 欢

主编絮语

宫承波

如今的“大数据”似乎已成为一个时髦的概念了。从学界，到业界，到官场，许多人张口闭口都是“大数据”如何如何——似乎不提提“大数据”即已落伍于时代，似乎不懂“大数据”学问就不能做了，记者就不能当了，当官就不合格了……

我是个文科出身的人，远离数学已三十多年，平时见到什么数呀、码呀，不能说天然地恐惧，起码也是自觉地回避——这不是咱的领地，不可轻易造次。但这回不同了，“大数据”如此铺天盖地，看来实在是躲不掉了，也就只好搜了几篇相关文章学习了学习。在此，不妨总结几点学习认识，以就教于方家，也与我等人共勉：

其一，大数据是人类利用计算机认识、把握人类行为、活动的一种“现代化”手段。计算机是工具，数据化是手段。它是计算机应用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行为、尤其是社会活动“数据化”的产物，其数据之“大”、之丰有助于我们对相关事实全面了解，洞微执著，对提高人类对于相关事物的把控和调节能力无疑能够提供强大助力；

其二，大数据的主观色彩是不容忽视的。就像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一样，大数据的本源是人类的行为活动，它是人类利用计算机观察、了解、认知这些活动的呈现，是一种人造的资源，看似客观，但实际上却是主观化的产物。类似新闻写作的“选择事实”和文学欣赏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面对同一事实，不同的挖掘主体，其数据也完全有可能会有差异、甚至差异很大的；

其三，大数据重在挖掘，贵在应用。好比从一座山上伐来大批木材、采来大批石材，用来做什么？怎么用？那就要看用的人是谁了。应用主体的德才学识、优劣高下决定了其价值取向、应用目的和应用策略，决定了这些数据在其手中的价值。

总之，拙见以为，大数据时代到来了，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无论学术研究还是社会管理，都必须高度重视，积极学习、应用，但却又不可迷知、迷信；而尤其是，大数据的主人是“人”，“人”是数据的主体，无论挖掘还是利用，其技能技巧似乎都不难掌握，难的仍然是人本身社会文化内涵的充实，是“人”的塑造。

主编简介

宫承波（1966～），山东章丘市人。山东大学文学（文艺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民族社会学）博士后。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任网络与新媒体（媒体创意方向）专业委员会主任、媒体创意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主要致力于传媒理论、媒体创意及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目录

CONTENTS

主编絮语

宫承波

特稿 Special Reports

- 2 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弘扬
——“人文精神再讨论”会议综述 毛冬冬

焦点话题：微电影研究 Focus

- 10 解读当前微电影发展的失范与规制 吴 迪
- 14 不求重建世界，但求重建你的眼睛
——波兰动画微电影《白寡妇行动》创意分析 林安琪
- 18 广告微电影创意探寻
——以耐克广告微电影《科比就是黑曼巴》为例 陈诺丹
- 22 当爱情成为一种“符号”
——爱情微电影《符号》创意分析 肖娅斓
- 25 科学的浪漫
——科学微电影《白眼之殇》创意分析 王 凡
- 28 微电影为品牌“化妆”
——广告微电影《逆时·恒美》创意分析 林文婷
- 32 此心安处是吾乡
——广告微电影 *LEAVE ME* 创意分析 冯雅雯

36	温暖亲情 人间大爱	
	——亲情微电影《心酸的恩情》创意分析	刘晶晶
40	创新思维在微电影中的运用	
	——以微电影《拾荒少年》为例	梁 杰
43	微电影镜头语言创意分析	
	——以《吾时将近》(Our Time Is Up) 为例	李思敏
46	未来的视界	
	——微电影 <i>Sight</i> 创意分析	付文卿
50	武汉系列城市宣传片的创意分析	刘雨丝 于晓婷 左 怡

新媒体前沿 New Media Frontier

56	浅析新闻客户端“手机人民网”的现状和前景	
		刘昶荣 成文胜
60	浅谈传统媒体微信订阅号的运营	
	——以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为例	夏 宾 成文胜
65	试论网络新闻评论专题的特色与功能	
	——人民网观点频道《聚焦改革 2014 两会言论》专题评介	刘辛未
70	新媒体背景下的新闻职业道德建设	
	——以北京电视台与郭德纲的微博骂战为例	段 然
75	中国媒体中的外国领导人形象探析	
	——以中青在线对奥巴马的报道为例	魏景飞
82	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功能探析	
	——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的省察	杨 璇

广播电视前沿 Radio and Television Frontier

88	留守儿童视界中的动画片暴力场景分析	
	——基于 S 省 W 县 L 中心小学留守儿童的调查	朱文哲
94	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研究综述	王 欢
102	英国广播公司电视新闻频道建设的成功之道	张学成

新闻与传播研究

News and Media Research

- 110 全媒体时代的媒介特征分析 赵淑萍 蒋 雯
- 116 影像逻辑的内在构成探析 金文恺
- 121 浅析新记《大公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与发展 田荣娟
- 126 企业报构建“走转改”长效机制的路径
——以《中国海洋石油报》为例 杨 彬
- 132 品牌跨文化传播中形象代言人作用机理与匹配性研究
..... 张景云 何思捷
- 137 传播学的欧洲哲学思想溯源 管 璘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y Research

- 144 “微”时代下网络社区的盈利模式探析
——以依托于社区文化的天涯为例 王靖雨
- 148 新世纪网络动画初探 朱逸伦

媒体创意与策划

Media Design and Planning

- 156 《故事新语》电视节目策划案 郭笑晨
- 161 《年代建筑资料室》电视节目策划案
——追忆年代故事，畅游年代踪迹 竺怡冰
- 167 《失落的美食》电视节目策划案 周诗好
- 172 《老“玩”童》电视节目策划案 武嘉臻
- 177 《谁是精英》电视节目策划案 关一文

创新传媒教育

Innovative Media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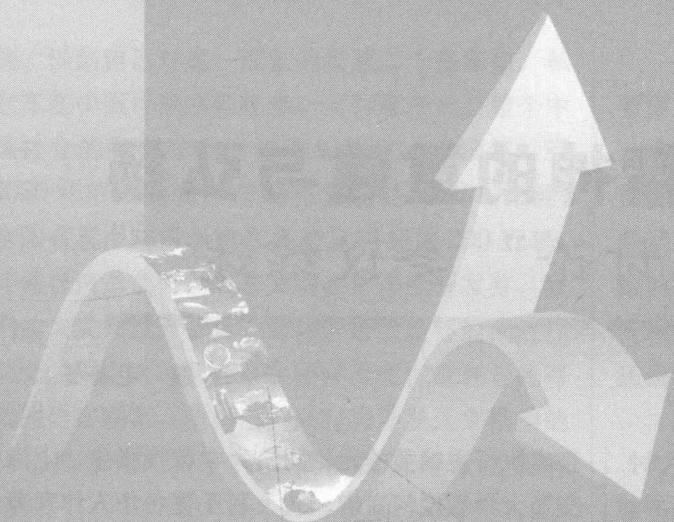
- 184 媒体转型中我国新闻教育的困惑 成文胜 荣 翌

读书乐园 Book Club

- 190 规范与自由：方法论上的矛盾二重性
——读《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有感 田 园
- 195 详而不繁，概而不陋
——读《广播电视概论（第二版）》有感 周家旺
- 197 以变局思策略，以创意谋变革
——《广播电视创意与策划》评述 刘辛未
- 200 《春晚三十年》读后 李忠利

封面人物介绍 Cover figure

- 204 青年学者范松楠



Special Reports

特稿

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弘扬

——“人文精神再讨论”会议综述

■ 毛冬冬

1993年,上海学人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旋即,讨论席卷并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当时的讨论涉及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参与者围绕着“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讨。市场经济是否会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或者它是否会反过来促进人文精神的重塑?虽然那场讨论没能达成普遍共识,却使得人们对市场经济给精神生活产生的正负效应有了较为深刻的认知。同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进一步认识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如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早已成为社会各领域不断变迁的助推器。当初那场讨论中所指涉的人文精神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人文精神在当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着怎样的局势?人文精神是否到了不得不重新建构的地步?又该如何重新建构?种种问题,使得一场深入、严肃的思想碰撞和理论探讨迫在眉睫。

2013年9月21日,由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郝雨首先发起并筹划的,以“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重建与弘扬”为主题的研讨会分别于当日上午、下午在上海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个会场举行。与会者包括:《文学报》主编陈歆耕、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院长郑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艺所研究员李建军、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上海文化》杂志主编吴亮、复旦大学教授邵元宝、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天津《文学自由谈》

杂志执行主编黄桂元、同济大学教授张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澳大利亚著名华人作家兼评论家黄惟群、复旦大学教授龚静、河北大学文学院院长田建民、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赵为学、《光明日报》文艺评论主编王国平、《中华读书报》主编舒晋瑜、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剑龙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宫承波、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谢清果、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曾一果、上海政法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李有亮教授等。

一、贴近当下现实,聚焦人文精神重建与弘扬

会议开始后,陈歆耕先生首先阐述了自己对这次会议主旨的认知与期待。他认为,虽然此次研讨会与20年前的那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存在某些内在联系,可以视其为人文精神讨论的一次延续,但此次会议的主旨并不在于对历史上的讨论做更多的回顾、解读与反思,而在于对当下现实的观察、关照与思考。同时,他也谈到,讨论“人文精神”这一话题,如果仅仅从概念到概念,空谈康德、马克思,是不会产生多大实际意义的。他希望此次会议的讨论更贴近当下现实的具体问题、具体现象,能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思考。

他以近十年来我国私家车数量的发展变化为

例,谈到自己对这一现象的反思。十多年前,私家车在中国可谓刚刚起步;而时至今日,整个中国社会的私家车拥有量已经过亿;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私家车拥有量将达到2.2亿辆,全国有五个城市私家车拥有量将超过200万辆。伴随着汽车文化、汽车文明在中国生根发芽,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此却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思考。很多汽车恶性事件频频发生,或许与此有某些内在联系。他指出,只有将涉及人文精神的问题具体化,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才更加有意义。

郝雨教授也谈到,此次会议应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自从研究方向从文学领域转到新闻传播领域之后,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很多现实问题的产生,论其根源都是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所以特别需要人文知识分子对这一话题予以特别关注。

如果说20年前的人文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失落的忧虑源自市场经济的勃兴,那么,在资本大量积累、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当下,人文精神的处境是否会变得愈加艰难?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市场化早已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生存样态,我们的文化界对此是否还拥有独立的话语权呢?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坦言,作为一个人文研究者,自己越来越对当下的许多社会现象感到“无语”,“这些社会现象跟我们的研究领域相关,但是我们却无法对此发声,即使发声实际上也产生不了什么效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读它。”他以今年文化界的热点事件——郭敬明《小时代》电影引发一系列文化争议的现象为例,阐释了人文研究者在当下社会现象中失语的内在因素。肖鹰认为,我们一些正面主流的文化评论在面对郭敬明时,可能还没办法找到自己的话语体系来面对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文化活动、或者说完全市场化的文化社会。

在肖鹰看来,当下谈人文精神,最重要的是要面对一个资本化的文化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将资本化的文化界理解到位,也才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把郭敬明这样似是而非的青春文学解读清楚。”对他而言,“作为人文学者,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文化从资本那里做一种解读与解救。人文学者的使命和责任,还是让文化回归心灵、回归自我、回归精神。”

那么,文化资源的市场化是否真的完全否定了人文精神的价值,挤压了人文精神在社会各领域中的空间呢?市场化的推进与人文精神的重建能否并行不悖?虽然肖鹰对如今文化市场化的现状感到忧虑,却也坦承,“市场化本身并不是坏事,市场化实际上和人文发展是并行的,一体两面,市场化强调尊重个体,以个人的价值为中心,这正是人文精神的题中之义。”

《上海文学》主编、评论家吴亮则认为,当下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问题其实正在于一切都不够市场化,或者说没有做到真正自由的市场化。在他看来,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不是市场经济、资本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当下的中国,用科斯的话说没有做到“思想市场”的开放,“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原创力严重匮乏,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就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思想竞争的社会。”他表示,事实上,人文精神的重建在于人的思想、内心价值的重建。

二、文明规范与价值取向,人文精神本质之辨

人文精神的本质究竟为何?它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关联?它是一种由人们共同建立起来的社会文明规范,还是人们在面对某一范畴或者某一类事物时的价值取向呢?

苏州大学曾一果教授认为,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人文精神究竟有没有失落?实际上,在

在他看来,人文精神的失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焦虑。“人文精神可能始终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而且,1993年,文学界在进行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是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情,主要针对的是商业社会,他们所感受到的更多的也是商业社会对他们自身地位的冲击。这其中,文学界受到的冲击最大。文学知识分子曾经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往往又自视甚高,所以在20年前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他们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觉得社会堕落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是否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堕落了?说实话,我没有很深刻的感受。”

曾一果教授坦言,自己更愿意把“人文精神”这个话题换成“人文主义”。“因为将‘人文精神’作为话题,好像感觉会很沉重,而转换成‘人文主义’之后,可能很多跟文化相关的东西就都可以涵盖进来了。听听音乐、看看画展,都可以看做是一种人文的熏陶,并非一定要把某些特定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看做是人文熏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比较赞同雷蒙德·威廉斯提出来的观点。他是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把文化看成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在新媒体环境之下,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找大家的共同点到是有必要的。并不是说社会多元化,就不存在一种共同的文化了。这种共同的文化就代表了一种共同的人文的价值的观念。包括杜威、李普曼在谈西方社会变化的时候,也都在寻找一种共同文化。总体上说,尽管在新媒介环境下有各种各样的危机,但是好像也不必那样悲观。当然,知识分子在这其中应该起到关键作用。”

对于曾一果教授的观点,宫承波教授并不认同,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人文精神对抗的是商业逻辑、市场逻辑。这是它的主题。回过头去看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在经济面前,在商业逻辑面前,在物质利益面前,精神的力量、

人文的力量,始终是脆弱的。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改变过的。也正是因此,哪怕是哀鸣,最可贵的还是人文精神及其倡导者。人文精神在如今的市场化浪潮中仍然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其日渐失落的情势也绝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焦虑。它的缺失和穷富也是两回事。无论什么时候,越是社会发展了,物质富裕了,我们越应该去倡导人文精神;越是始终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搞文学的知识分子,越要把人文精神的倡导与人文精神的弘扬摆在一个主流位置上。一果教授可能是从另一个侧面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不是特别赞同。”

田建民教授则认为,在进行人文精神讨论时,应该首先对人文精神的概念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人文精神绝不仅仅是爱心,也不仅仅是道德这么简单。它本质的、核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文精神究竟要怎样界定?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我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搞清楚。”谈及20年前的人文精神讨论会,田教授认为那次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方认为,人文精神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而强调人的个体自由、选择和个性的张扬,在很大程度上,好多人把人文精神解释为人本主义,甚至有人把人文精神作为欲望扩张的遮羞布;另一方着眼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超越性价值,把人文精神看成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关照和理性的把握,把它作为人的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信仰,甚至有人把人文精神当成道德信条,进而成为一种道德暴力。这也是人们没办法忍受的。这两种观点都走向了极端。”

田教授尝试着对“人文精神”进行界定。“‘人文’,顾名思义,就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精神’,一是指事物的本质或者核心,二是指人的头脑对于客观世界的反应,也就是意识。那么这样看来,人文精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一个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实质或核心是什

么；二是人文意识，也就是说强调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对人类文化或文明的理性关照和把握。所以，人文的实质和核心，其实也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人创造了文化和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的一种生存智慧。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是多方面的。物质生产的极大进步使人们从那种茹毛饮血的生活进入到享受高科技成果的现代化生活；而就精神文明来说，文字的出现使人类获得的各种知识和经验得以记载和传承，艺术的创造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核心的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碰撞冲突中建立起来的社会文明规范。这种社会文明规范是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核心和实质。它表现为人的个体的本我欲求与社会群体的文明规范之间的矛盾统一，其本质目的就是为了人自身及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社会的文明规范对每一个个体的本我欲求都是一种限制，但同时又是一种保护。二者之间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那么极端地强调一个方面而贬抑另一个方面，就会破坏二者的平衡统一，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西方中世纪严酷的神权统治，我国封建时代的那种存天理灭人欲，十年浩劫。那种文化专制主义，否定个体人的价值和尊严，对人性进行粗暴地践踏。那么不了解社会文明规范的本质意义和目的是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反之片面地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 and 绝对权力，放任个体贪欲的洪流，去冲毁社会文明规范的堤防。那也是了不得的。所以，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既不能只看到其最终落脚点是对人生存的终极关怀，而看不到这种终极关怀是以遵守和维护社会文明规范为前提的；也不能把人文精神道德理想化，而否定人的个体的合理诉求。”

官承波教授认为，田教授所述内容实为“人类文明规范”，而非“人文精神”，是否符合人类文明规范不是人文精神的实质。他将“文化精

神”归结为人面对一个范畴或者一类事物时的价值取向，并认为这才是文化精神以及更进一步的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是在不断变动的。人文精神最终应该落脚到文明规范上，还是应该落脚到价值取向上呢？我认为，一说到规范，就局限于群体，而相对忽略了个性。而价值取向不仅仅可以涵盖群体的范畴，同时也是尊重个体的。所以，将人文精神定义为一种价值取向可能是更为贴切的。”

三、知识分子理应担起人文精神重建之责

“由于知识分子的失职和知识阶层的不作为，逐渐导致人文精神的危机几乎蔓延到了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而且这种危机比许多年前还要严重得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建军的一席话无疑代表了当天多数与会学者的观点和感受。一个社会的人文价值失范、人文精神式微，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又该怎样担负起自身的职责？

在李有亮教授看来，在拿当天的讨论与20年前的讨论相比较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能让“道德激情”成为过去式。20年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讨论呢？我认为，当初那些知识分子探讨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因为自己被边缘化之后表现出的一种焦虑，他们依然是有他们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担当，一种对于民众即将陷入新的蒙昧状态的“公共的焦虑”。虽然商品经济刚刚展现出初始状态，但是他们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一洪流到来之后，恐怕会导致一场灾难，所以这种焦虑不单单是对个人处境的焦虑，而是带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品质的，是一种传统的人文关怀的体现。那么，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呢，他们确是一批先知先觉的人，今天的状况甚至比他们当初想象的还要严重。对于20年前

的那场讨论，我们不必去关心它的理论价值和社会影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它表现出的一种姿态和象征意义。它让大家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批人，面对着整个世界一体化、现代化的进程，敢于提出质疑并保持足够警惕。当然，我们要反对道德霸权，但道德激情无疑是可贵的。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尤其需要这样一种品质。

谈及知识分子双重责任时，李有亮表示，一方面，知识分子应继续承担批判社会的职能。“尽管现在‘公知’已经成为一个被取笑的词汇了，但是中国目前特别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把社会批判的职能担当起来。美国的50、60年代，日本的70、80年代，很多国家都是这样过来的，都是他们的知识分子担当起来的。我们为什么要缺席呢？我们应当有这个自觉，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另一方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具有自我批判的意识。“批判不能只向外，也应该勇于把它向内转，拿同样一面镜子照照我们自己，让我们看看自己目前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种对外的批判和对内的反省是密切相连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这样一份真诚、这样一份勇敢，只是去批判社会，我觉得这也没有多大的力量和说服力。我们必须首先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我说到了，并且我还能做得到，哪怕只做到一部分，我觉得你就具备了批判的资格。只是说给别人听，只是想启蒙民众，说实话，我们连自己都不信。我们有必要做一些自我检讨。”此外，李有亮认为某些人文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排斥，对大众需求的贬低，是没有道理的。在新媒体时代，人文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是有融合和共建的广阔空间的，而非彼此对立。

以李建军、郜元宝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均认为，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重建理应负有重要责任，但是同济大学教授张生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工业化生产制度、生产方式一旦来临，便不可逆转，我们采取任何的方式都不会有变

化，所以也不必为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而焦虑。”在他看来，当下的人文精神已经有了自己全新的形式，“表面上人文精神好像丧失了，我们该为它唱一句挽歌；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以及新文明的转变而出现，只不过与我们习以为常的西方文艺复兴时候的人文精神有所差异罢了。”因而他进一步提出：“不应再把作家、学者当成这个社会的导师”，作家和学者在当下多元的人文精神下，已经被剥下了崇高的外衣，当下的人文精神重建依靠的是，“人们通过现代文明自己教育自己”。

四、人文精神重建，重中之重何在

如今，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已呈现全面退却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传统人文精神的失落呢？从媒介的角度出发，人文知识分子又能为此做些什么？人文精神的重建是否该转向个体的实践？能否从社会的宏大场域中返回到个人的外部生活和内心思维情感的各个层面，以期积少成多最后蔚为大观？这或许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生活也好，做学问也好，其实都是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行为里面有每个人的审美取舍、审美标准，包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而这些都只代表你自己，不代表别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认为，当下的人文精神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承认个体差异。他指出，当下文学评论中存在的一种倾向，喜欢就某一个问题达成默契，似乎达成默契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而评论界的群体作战也不鲜见。在他看来，文学评论恰恰因为有不能达成默契的东西，才能够有文学评论的多元样态和丰富见解。“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像以前那样，都是以同样的景象、同样的景观呈现给我们的话，想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

这一观点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的感触不谋而合,“在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社会变迁之中,我们每一个个体的思想道路、命运体验都非常漫长。20年的时间里,我们对个体研讨,就能够切实地考验人文精神的基本状态。”对他而言,这种个体的研讨,应当回到社会结构中来考察,“诊断每一个个体,怎么在这个结构中到达他现在所处的位置,将包括尊严、价值、信仰的确立、道德的重建在内的种种问题,回溯到对每一个个体的思考上,思考别人的同时也进行自我思考。只有通过这种思考与自我思考、诊断与自我诊断,才能够使人文精神的探讨深入下去。”

上海大学副教授赵为学提出,当代中国应当从当初人文精神的弘扬逐步深化发展为对公民精神的倡导。“当国家放开对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控制,将经济从国家的支配型计划体制中解放出来时,也将个人从无所不包的城市单位和村集体等社会主义机构中解放出来。这导致了一种有限的、国家认可的个体化过程。”当“个体化”、“风险社会”、“全球化”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标签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人文精神的弘扬这个阶段,公民精神的倡导理应成为时代要求的应有之义。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龚静看来,与其对人文精神进行理论化的阐释,不如进行具体而微的实践,“人文精神要谈,但基本更要做”。具体而言,就是在人文社会的架构里做一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究其根本来说就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活、行为、思想、尊严给予最基本的肯定和尊重。龚静认为,这有赖于日常生活中个人的内在修炼,“每个个体都是造成社会问题的因缘,我们要有信念、有持守、有反省觉知。解决好自己的内在问题,对人、事、历史、文化、现实或多或少有一些关照和思考,其实也便是一种人文精神了。”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院长郑涵从自身的经历出

发,谈到了自己对人文精神重建的看法。“人文精神就是要反对文化专制,但是如果只从精英主义的角度去反对,或者说只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反对,这恐怕都是有问题的。”他进而谈到,约翰·密尔顿曾经在他的著作《论自由》中谈到这样一个观点,一个自由的社会是可以让个人反对全社会的,但是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伤害别人。“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的某些个体可以不受限制地侵犯他人的权利,企图在这个社会上游刃有余,或者说客观上游刃有余,那么,这个社会将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人文精神的问题恐怕是这个社会各类问题的集中体现。如果这个社会的文化专制主义不转变,人文精神的转变将是困难的。”

马明高先生认为,讨论人文精神,最重要的是“回归常识”。“人首先应该是诚实的。我们先不说其他群体,就知识分子而言,很多人向政治妥协,向金钱妥协,这都是不诚实的表现。其次,人应该有敬畏之心,不能为所欲为,这恐怕就是我们缺乏信仰造成的。再次,人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求。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是,我赚的钱越多越好,当的官越大越好,房子有三套五套也不够,这简直是本末倒置了。有一套房子够你生活就行了,不管你当什么官,有一份能够养家糊口的职业就行了。现在应该提倡一种节俭的意识,只获取能够满足自己生存基本需求的物质就可以了。最后,人毕竟是有精神和灵魂的。在衣食住行得到满足之后,也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宫承波教授认为,新媒体时代的人文精神已经发生了“异化”,具体表现在“内容传播的失范与媒介接触浅层化”、“意见表达的失范与公共空间建构的困境”和“媒介审美失范与快感审美”三个方面。就“公共空间建构的困境”而言,他谈道,“从社会学及民主政治视角来看,新媒体为每个个体都带来了表达的机会与平台,促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甚至有人说,真正民主的时代到来了。这样想恐怕太过简单化了。任

何工具都是供人来使用 and 控制的。如果人们用它来做促进民主政治的事情，它就是民主政治的福音；如果不是这样呢？反而会带来社会的混乱。众声喧哗，人人都有发声的机会，带来的并非都是民主政治。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对于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的“救赎”之道，宫承波坦言，目前，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也只能把握一个大致的方向。他本人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培育广大受众的媒介素养，尤其是新媒体素养。第二，建构理性的公共空间。第三，回归主流美学话语。他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杨剑龙教授提出，人文精神最核心的一点应该是“把人当作人来对待”。“我们常常在新媒体中看到许多令人发指的事件，很多都是我们从前闻所未闻的。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事件都是不把人当作人来对待的。”在杨教授看来，儒家文化的理念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把人当作人”，而官场腐败与环境污染，当前中国社会的这两大问题之间不仅相互牵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一理念的丧失所导致的。

针对目前新媒体时代的人文精神状况，厦门

大学的谢清果副教授提出，首先应该着力于加强媒介批评的力度和品质，而且应该将人文精神作为媒介批评的终极指向。在他看来，媒介批评需要人文精神的观照与指导，而人文精神也需要媒介批评的培育。媒介批评过程中应当遵循“人性、理性、灵性”的人文精神要旨，以维护和高扬人文精神作为自己的天职。而人文精神既是媒介批评的思想资源，又是媒介批评正常深入开展的精神动力，两者共同竭力去营造健康和谐的媒介批评与“求真、趋善、臻美”为核心内容的人文精神良性互动的文化环境，为我们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提供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杨剑龙与郝雨两位教授分别对下午的会议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此次会议的意义与成果。“事实上，中国社会经历这些年的发展，确实在很多方面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今天讲人文精神的失落，也并非是说我们的精神已经一败涂地了。我们只是希望社会比以前更好。我们讲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也好，责任意识也好，都是抱着满腔热忱和希望来说的。这便是这次会议真正的价值所在。”

【毛冬冬（1989—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 2013 级硕士生】